

## 观点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  
如何更好地呈现“民族性”

王迅

回顾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更好地总结其文学特点,展望其发展趋势。其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一是1949年到1978年,属于与时代共名的民族书写。在这一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与整个时代的文学整体氛围是一致的,意识形态表达比较突出。在一些作品里,作家能够比较好地将时代命题与民族元素较好地融合起来。比如,长诗《百鸟衣》表现了劳动人民与封建势力之间的冲突,控诉土司制度的罪恶。这些内容的表达是蕴含在民族元素之中的。但我们看到,在大多数的作品中,民族元素只是为作品披上了所谓“少数民族”的外衣,很少触及及深层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而民族元素只是作为政治图解的点缀,服务于意识形态表达。

二是1979年到1988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性逐步加强。以韦一凡小说《姆姥韦黄氏》为例,这部小说写壮族婚俗,新婚三天新娘就回娘家住,直到怀上孩子才能到夫家坐喜盘。也就是说,孩子出生前,女人不能算作夫家的正式成员。作品通过这个风俗化的叙事,塑造了女主人公韦黄氏勤劳、善良和坚韧的形象,同时也抨击了落后婚俗给人带来的悲剧命运。这部小说对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勾勒只是初步尝试,深挖民族精神的作品在广西文坛还不是太多。

三是1989年至今,少数民族作家不断进行创作上的突围。这一时期,广西召开

了两次文学理论讨论会。一是大家熟知的广西文坛“88新反思”,二是1989年“振兴广西文学大讨论”。会上,广西作家评论家大胆提出超越刘三姐模式,要进行文学上的创新。在这之后,鬼子、凡一平、李约热、田耳、红日、杨仕芳等少数民族作家不断涌现,使广西文坛涌现了一支庞大的文学创作队伍。

到了90年代,从鬼子开始,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民族性的呈现方式是不大一样的。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末,广西涌现出陆地、李英敏、韦麒麟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他们为广西文学在全国争取了荣誉和地位。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创作是与那个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百鸟衣》《刘三姐》等与时代共名的民族题材创作,昭示出一种“看得见”的民族性。到了90年代,从鬼子开始,广西少数民族文学逐渐呈现出一种“去民族化”的创作态势。无论是鬼子、凡一平的小说,还是李约热、田耳、杨仕芳的小说,我们已经很少能看到民族化的显在元素。90年代后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大体上是一种融入主流的创作,而且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三个特征:超越民族身份、突破地域性、摆脱对少数民族叙事资源的依赖。这种“去民族化”的创作所追随的是全国的文学潮流,确切地说,就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与融合,鬼子、田耳、李约热的小说就不乏先锋色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性的放弃,只不过他们将民族性的书写隐含在文本的内核,而不是直接

显现出来。比如,杨仕芳曾说,他的小说试图挖掘广西三江侗族同胞的隐忍性格。不难看出,90年代以来,广西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性书写不再表现为民族题材以及地域民俗民风的显在书写,而把民族性书写内化为一种民族文化性格的发掘。

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身份、民族题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从全国层面来看,那些取得较高文学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比如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宁夏回族作家石舒清等获得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他们的代表作都与自己的民族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以《尘埃落定》为例,这部小说描写土司王朝的生活方式和藏族神秘的民间禁忌、巫术、风俗、宗教等。但阿来并非就民俗而写民俗,他很警惕那种显在民族性,而更看重对之进行审美转化。首先作者写出了狩猎民族的英雄主义本质。应该说,任何时代都呼唤民族英雄的出现,这可以说是恒久不变的文学主题。其次,这部作品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理念。作者通过傻子的形象完成一种“至美人性”的书写。这种至美人性所代表的精神价值刚好与90年代物质主义的时代氛围构成一种张力结构。三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民族信念。民族题材的审美转换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实现民族人文地理刻度与精神坐标的建构,这是一种内在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审美建构。

从近期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来看,田耳的《一天》、李约热的《人间消息》、杨仕

芳的《黎明将至》等小说集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广西的人文地理刻度及其当地的精神坐标。凡一平的上岭村、田耳小说中的侗城、李约热的野马镇、杨仕芳的侗族乡村等,已经成为广西的重要文化地理。这是他们的创作获得许多认同的重要原因。

但不能不指出,与其他省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相比,广西民族作家的民族化书写体现了一种“看不见”的民族性。这种内在的民族性书写的审美辨识度不高,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审美错觉。所以,对这种“看不见”的民族性,有待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概括、梳理和研究。而事实上,民族性书写的审美维度是多元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文学评判的标准进行单一化处理,对民族文学来说尤其如此。

总的来看,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越来越呈现出融入文学创作主潮的创作态势。与此同时,凡一平、田耳等作家作品进入各类文学排行榜,影响越来越大。其实,他们的创作很难说是以民族性的缺失为代价的,而是呼唤着一种新的民族文学评价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民族辨识度不高的创作看作是对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超越。即便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表述,这种“超越”也不是说要放弃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依赖的民族身份和民族题材,而是要通过人文地理刻度和精神坐标的建构,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之魂,书写少数民族精神史与心理史。应该说,这是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 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支持和文艺方针的鼓舞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纵观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态势,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成绩斐然,民间艺人创作的口头文学可圈可点。因此,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日益发达和口头文学的活态传承并驾齐驱,进而共同构成了双峰并立的发展态势,源源不断地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光彩。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设立有着紧密联系。1980年7月2日至10日,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会上决定设立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从第六届开始,这个奖的名字改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从而更加明确了这一奖项的导向性标识和不可替代性。据中国作协网2018年5月发布的“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一览”初步统计,目前共产生了680部(篇)获奖作品、37名获奖译者。从这一文学奖项设立的初衷来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创办,对于发现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人才、提升少数民族文学质量以及扩大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切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换言之,在骏马奖的推动下,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越来越凸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的高度融合,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版图的独特风景。由此可见,这一国家级文学奖的设立,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伴随着我国当代文学的快速进展,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娴熟运用汉语或母语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这些书面文学作品不仅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对象,而且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重要支撑。更重要的是,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持续评奖的影响下,一些民族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创作人才。以彝族为例,吉狄马加的组诗《自画像及其它》以其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深刻的人类意识获得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一等奖。在此之后,彝族青年诗人诗作不断涌现,在题材和形式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阿蕾、贾义盘加、时长日黑等彝族作家也相继获得了骏马奖,成为彝族小说界的代表作家,并影响了许多彝族青年写作者,带动彝族小说创作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获奖作品对后来的彝族小说创作产生了示范作用,造就了新的当代彝族文学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借鉴中的传承与创新,所以是非常有价值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机制,催生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为续写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学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地理学提供了大量新材料。

随着全国性各类文艺评奖机制的逐步完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也从第八届开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比如,不再设置“儿童文学奖”,压缩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等各个奖项的获奖数量(不超过5部)。第九届增设了“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从第十届开始将评奖时间从3年延长到4年,不再设置“理论评论奖”“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这充分说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风向标作用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提倡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体现时代风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在历届骏马奖的评选中,第二届至第九届都设立了理论、评论奖,共有33部(篇)理论、评论作品相继获奖。通过这一奖项,推出了一批批少数民族文学优秀理论、评论成果,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新人,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发展。绝大多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获得骏马奖之后,更加关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有关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者娴熟运用文学人类学、文化遗产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以高远的学术立意、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精湛的学理阐释,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究,为建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作出了贡献。近10年来,徐新建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李晓峰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1949—2009)》等多项成果的推出,都有利于深入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促进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提炼和建构。

从第十届骏马奖起,理论评论奖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继续设置。但我看到,在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项目中,对理论评论类项目加以扶持。同时,中国作协还专门设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签约项目。这说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希望骏马奖能够恢复理论评论奖,让我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翻译和评论相得益彰,共同承担新时代所赋予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促进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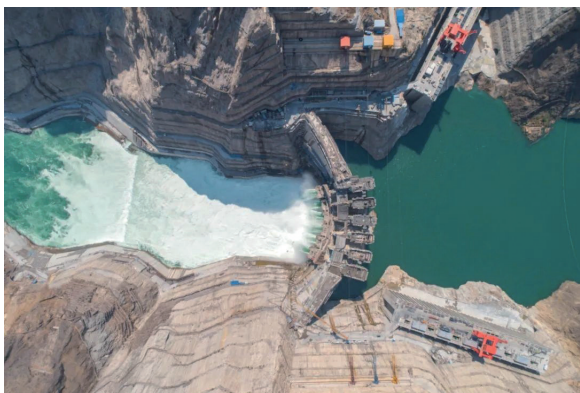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40年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机制逐步趋于完善,从原初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扶持激励,到如今的优中选优原则,使之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这一奖项的创办,对盘点、审视、筛选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以及促进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有力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阿牛木支(彝族)

## 乌东德的新变

曹卫华



## 三

乌东德电站是中国第四大、世界第七大的水电站,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水运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近1000亿投资,自2011年开始筹建,2015年正式开工建设,至2020年7月,十二台机组已经有四台开始发电。2021年10月,十二台机组将全部建成发电。如此高效的建设速度,靠的正是红军长征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300多米高的大坝把金沙江拦腰切断,连通了江两岸的云南四川,两岸山体被掏成一座地下空城,隧道循环往复,四通八达,十二台机组,六台在云南,六台在四川,都安置在山肚子里。梯形大坝,坝宽超过30米。四条水龙从大坝中段的水槽飞跃而出,轰隆隆响。江面上白浪滔滔,水雾茫茫。工程车、运输车这条隧道进,那条隧道出,在大坝往来穿梭。

金沙江大峡谷气候炎热,正烈日当头,工人们挥汗如雨,在大坝上忙活。他们的红色工作服上,绣着“葛州坝水利建设集团”字样。中午12点,面包车、皮卡车、电动三轮车把饭送到工地上,工人们陆续放下手中的活计,向送饭车靠拢。打了饭的工人,找个地方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吃起来。饭菜不错,豆腐干、炒肉片,家常小菜,每样有点。

河南来的陈师傅估计三五天没刮胡子了,粗硬的胡茬钢针样钉在下巴上。我问他这么热的天,是不是吃完饭就要接着干活?他告诉我,是!热就热点,跑来跑去耽误工夫。我问他,参与这么大的重点工程建设,有什么感受?他想想,笑笑说,能有什么感受,不过,回家过年说起来,还是有点自豪的。

## 四

金沙江大峡谷沿岸土地稀少贫瘠,山高坡陡,交通极为不便。原来,居民住房大多用泥巴冲墙,建在江边的山坡、台地上。他们守着金沙江,人畜饮水却十分困难。路不通,老人没出过山的比比皆是。电不通,村民没电视看,寂寞无聊,天黑就睡。学生上学,要走两三个小时。生了重病,

要找人辗转抬出大山,才能得到医治。乌东德电站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这里的经济发展。路通电通水通,生态环境改善,经济环境改善,给当地居民带来众多发展机遇。

库区建设,移民搬迁,涉及禄劝县乌东德、皎平渡、汤郎3个乡镇,7个行政村,30个村民小组,1029户,3662人。移民新村集中建在距离乡镇不远的山坡上。阳光下,一排排白墙灰瓦的小洋楼喜气洋洋。道路贯通整个移民区,区内有小学、中学、卫生院、活动室。

2019年10月,农户全部搬入新居。农户家中,衣柜、家电一应俱全。有的农户在门前、阳台种了花草,有的农户利用楼下的堂屋开起小饭馆、小超市……

疫情好转,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加之气候炎热,出门的人少,小区里静悄悄的。入户找了几个留守老人聊了聊,都一个劲地夸党的扶贫政策好。

## 五

解读禄劝县扶贫攻坚取得的成效,是我们这次采风的重要任务。由此,我们走进了乌东德镇赊角村干塘子村民小组。

干塘子村民小组仅42户,152人,坐落在风帽岭下,海拔3000多米的高寒山区,周围森林密布。因为寒冷,这里仅出产洋芋、荞麦、青稞等农作物。过去,虽然生态环境优异,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物产单一,农户的日子过得非常贫苦。

扶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干塘子村被确定为生态旅游示范村,入村公路修通,村民住房重建,村里道路硬化,饮用水进村入户,标准化公厕建成,房前屋后的田地加装了护栏。村庄后面的山脚下,还修建了供村民演出娱乐的舞台、广场,通往后山的小路还修了凉亭、栈道。墙是白墙,瓦是灰瓦,屋顶墙体间统一绘了灰色装饰线,外墙上都挂了装饰画。山林葱郁,草场如织,一个美丽的田园农庄像一幅素色的刺绣,铺展在翠绿的山川草地竹木之间。

50多岁的善治学神情有些腼腆,儿子已经独立成家,在外打工,女儿也已出嫁,家里就剩下夫妻二人。善治学家的住房是10年前盖的,还比较宽敞,一个院落,一排房,堂屋左边是厢房,右边是厨房,另外还有猪圈、牛圈。堂屋左边沙发前,水泥地上被善治学敲掉一块,做了火塘。扶贫攻坚阶段的宜居农房建设,经过评估,善治学家享受B级农房改造政策,政府补助两万多元,他用这钱换了屋瓦,加固了房子,美化了院落。厨房还是老样子,里面的墙被熏得黑黢黢的。善治学老两口非常勤劳,除种地外,靠发展养味摆脱了贫困。

孙宗芬70多岁,身体还硬朗,背着个大背篓在忙活。她家的老房子评估为D级危房,必须拆掉重建。拆老房子之前,政府为她盖了两间简易的过渡房。承载着她大半个人生的老房子就要拆了,孙宗芬有些不舍,一直在院落里拾掇,把一个狭窄的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说起来,孙宗芬是个不幸的却令人敬佩的女人。当小学教师的丈夫与她育有3个孩子,却在她35岁那年突然病逝。为了3个孩子,她没再嫁,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如今,孩子们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事业,都曾经多次提出,要把她接到山外面住,孙宗芬却不愿意。原来的老屋是没办法住了,幸好赶上党的好政策,重建了新居。

在乌东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人民群众身上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体会到脱贫攻坚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7月21号至23号,我随着昆明作家艺术家采风团走进乌东德进行采访。我们直接来到农村,到工地,到农户家,去感受真实的生活。我们与工人师傅交谈,与农民交谈,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金沙江大峡谷轰轰烈烈的水电站建设,去观察党的脱贫攻坚政策给昔日贫困的农村、贫苦的农民带来的生活上、思想上的巨大变化。

## 一

下着小雨,公路湿滑,车行进不算太快,好在雨一会就停了。大雾从两边山峦升起,漂浮在密林上空。一位穿皮褂的牧羊人赶着两头牛和几十只山羊从密林中出来,又隐没在密林中。包谷苗已经吐穗,豆角苗缀满星星点点的白花,烟叶伸展开肥厚的巴掌,头顶着小黄花……两位采蜂人用高倍望远镜朝远处瞭望,寻找隐藏在悬崖、树干上的野蜂巢。

当日,正逢云龙乡的赶集日,有几个小贩在路边收购野生菌。我问了问,收购价不到昆明市价格的三分之一。集市上到处都是外来的水果,低价的糖果、糕点摊到处都是。还有不少拾菌人陆续从密林中朝集市赶来。雨水好的年份,拾野生菌的收入占了附近农民年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野生菌是天下最美味、食品,从来不愁销路,几个小时后,云龙沾满露水的野生菌便会出现在昆明的农贸市场,甚至空运至北京、上海、广州、香港……

云龙是禄劝彝族自治县人口最少的乡,云龙水库像片碧玉镶嵌在崇山峻岭之间,一条直径2.5米的水泥管道以倒虹吸的方式把水库的水输送到昆明,解决了昆明市区六成的生活用水。为了确保水质的纯净,云龙山区大片农田土地退耕还林,成了云龙水库的水源涵养地和保护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禄劝县的云龙乡是昆明乃至云南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典范。

## 二

皎平渡是金沙江大峡谷的一段,位于云南禄劝县与四川会理县交界处。现在,这里成了乌东德电站的库区,水位比过去升高了40多米,按照电站的规划设计,水位还将提高30多米。过去站在皎平渡需要仰视的笔架山、毛公山现在举目可及。原来的村庄、街道已经没于水下,只有一段简易公路像条蟒蛇把头伸进水里,留在山坡上的尾部牵引着人们的记忆。

乌东德电站是国家西电东输的重点工程,是金沙江中下游大型梯级电站的第一梯级。这个梯级水电站包括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2020年10月前后,随着白鹤滩电站的建设,位于皎平渡下游的树桔红军渡也将被淹没,皎平渡已不复存在,树桔渡也将不复存在,选址重建,那是必然。重要的是,长征精神不能被淹没,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必须一代代传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长征中发扬光大。

一座水泥桥飞架两岸,站在会理县“长征驿站”眺望前方,夕阳下,山峰青翠,连绵起伏,披了一道金色的霞光;低头俯瞰,峡谷中的阳光已经爬上山坡,库区的水有点浑浊,却也静如止水。努力回忆皎平渡原来的模样,我突然想,毛泽东、朱德以及那些从这里走过的红军,当时或许并没想到过金沙江大峡谷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然而,今天大规模的水利水电建设,不正是他们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延续吗?

